

崔承老的崇儒抑佛觀

李海濤*

目次

- I. 序言
- II. 時代背景
- III. 崇儒思想
- IV. 抑佛思想
- V. 余論

【국문초록】

高麗 儒者인 崔承老가 당시 사회의 상황에 따라 고려 成宗이 儒教를 존중한 태도가 계기가 되어 崇儒抑佛觀을 내세웠다. 즉 유교로써 치국의 근본을 삼기를 강조하고, 불교의 사회적 폐단을 論斥했다. 최승로가 숭상한 儒學은 漢唐의 유학이다. 仁政思想, 禮教思想, 人倫思想을 매우 推崇하고 그런 사상을 바탕으로 고려의 國教인 佛敎에 대해 적극적인 비판을 전개했다. 최승로는 고려 불교가 여러모로 유교와 맞지 않아 당시 사회에서 종종 악폐를 초래한다고 여겼다. 따라서 최승로가 주요하게 사회의 危害의 각도에서 불교를 비판했으나 불교의 教義와 教理를 부정하지는 아니하였다. 그래서 최승로는 유교를 통하여 불교를 억제하고자 했을 뿐이며 완전히 불교를 배척하는 뜻이 아니라고 할 수 있다.

주제어

최승로, 유학, 불교, 고려

* 中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 哲學研究所 研究員

【摘要】

高麗儒者崔承老根據當時的社會狀況，以成宗的崇儒態度為契機，提出了崇儒抑佛觀，即強調以儒教為治國之本，抑制佛教的社會弊端。崔承老崇尚的儒學是漢唐儒學，他對仁政思想、禮教思想、人倫思想推崇備至，並用它向高麗國教佛教展開了積極地批判。他認為高麗佛教在很多方面不合於儒教，給社會帶來了種種弊端。可以說，崔承老主要是從社會危害的角度對佛教進行批判的，而並沒有否定佛教的教義、教理。也就是說，他只是用儒教來抑佛，而並未排佛。

關鍵詞

崔承老 儒學 佛教 高麗

I. 序言

儒學思想是韓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韓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即使在現代韓國社會中，儒學也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迄今為止，中國對韓國儒學進行研究的時間並不長，只有短短的五十餘年。就研究陣地來看，中國對韓國儒學進行研究的中心主要有兩個：一是以延邊大學為中心，一些學者借助語言優勢開始對韓國哲學進行了通史性的梳理，從而完成了中國第一部韓國哲學著作《朝鮮哲學思想史》¹⁾；二是以北京為中心，一些學者借助中國哲學的理論功底開始擴展研究韓國哲學，尤其專注於對韓國性理學的研究。就研究內容來看，中國的韓國哲學研究主要集中在韓國性理學部分，特別是對李退溪的性理學研究，從而，致使中國現有的韓國儒學研究當中鮮有關於朝鮮朝以前的儒學研究。這裏，一方面可能是由於史料的匱乏所導致的結果，相對於朝鮮朝的性理學著作而言，歷史留給我們可供窺測朝鮮朝以前的儒學思想的史料非常有限，從而導致了中

1) 朱紅星、李洪淳、朱七星：《朝鮮哲學思想史》，延邊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國很少有學者研究朝鮮朝以前的儒學；另一方面可能是由於研究前的預判而使然，一些學者認為朝鮮朝的性理學是對程朱理學的繼承與深化，它有其自身獨特性，但朝鮮朝以前的儒學則不過是漢唐儒學的翻版，因而失去了展開深入研究的必要。然從中國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這一觀點可能是非常武斷的，因為我們並未對朝鮮朝以前的儒學展開深入的研究，沒有研究的結論是經常靠不住的，它可能出現錯判，或是缺乏論證。所以，我們應當加強對朝鮮朝以前的韓國儒學進行研究。

崔承老是(927-989)是高麗前期儒學的代表人物。在韓國哲學史上，他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崔承老的儒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朝鮮朝以前儒者的基本觀點。從新羅的智照夫人、強首、薛聰、崔致遠等人、高麗的太祖、金審言、李陽等人的隻言片語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崔承老的儒學思想的體現。但是，因為有關他們的記述較少，所以很難窺其思想全貌。所以，可以通過崔承老的儒學思想來加深對朱子學傳入之前的韓國儒學的理解。其次，崔承老在韓國哲學史上第一次舉起了批判佛教的大旗。中國學界在談及韓國對佛教的批判時，常常提及的是鄭道傳的排佛論，而往往忽視崔承老對佛教的批判。實際上，崔承老在高麗前期已經指出了佛教的種種社會弊端，突顯了高麗佛教對社會的危害。同時，高麗成宗對崔承老抑佛政策的贊許也使得佛教勢力有所消退。可以說，崔承老對佛教的批判為朱子學傳入以後，鄭道傳的積極排佛論做了思想上和實踐上的鋪墊。

因此，可以說，研究崔承老的儒佛觀不僅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也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

II. 時代背景

崔承老生於慶州官宦之家，自幼聰敏好學，善於做文章。在他12歲時，高麗太祖召見他並命他讀《論語》。由於他出色的表現，太祖嘉獎他為元鳳省(如翰林院)學士。自此，崔承老開始了仕途生涯。在他從政之間，先後侍奉了太祖、惠宗、定宗、光宗、景宗、成宗六位高麗君王。這也使他對高麗的社會狀況有了更深的了解

和認識。所以，當成宗即位後，向群臣求治國安邦之法時，崔承老為求報國安邦，曆陳太祖至景宗五朝政化善惡，告誡成宗以史為鑒，取其善者，去其惡者。同時，他又畢其心力擬出《時務二十八條》²⁾，希望成宗用其治理國家，永葆國業。總的來看，崔承老的治國安邦之法就是以儒教作為治國之本，抑制佛教的弊端，即崇儒抑佛。崔承老之所以提出崇儒抑佛政策，這是與高麗當時的社會現狀分不開的。

西元918年，王建取代了後高句麗弓裔登上王位，並隨後歷經19年統一了混亂的後三國(後高句麗、後百濟、統一新羅)，從而使韓半島歷史進入了又一個統一的時代——高麗。高麗太祖王建在位26年，勵精圖治，為高麗五百年的基業奠定了基礎。總的來看，太祖所奠定的治國理念基礎就是儒與佛的互為補用。誠如韓國著名學者李丙燾先生所說，在高麗前期和中期，儒教為齊家理國之學，即政治經濟之學，用以指導實際生活；佛教為修身治己，安心立命之教，用以指導精神生活。³⁾ 儒與佛互為表裏，互為補用。然太祖之後，歷代君王多競造寺塔，廣置法會、齋會，使佛教越發興盛，從而打破了儒佛之間的平衡。

在高麗初期，太祖認為高麗國業有賴於佛教的護衛，所以廣建寺院，派遣高僧住持寺院，用佛法僧三寶來鎮護國家。“我國家大業必資諸佛護衛之力，故創禪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業。”⁴⁾ 太祖所建立的信佛護教、用佛法祈福禳災的精神被其後的高麗歷代國王所傳承，並愈演愈烈。第三代國王定宗，性好佛，以人君之尊，奉佛舍利，步行十裏至開國寺安放。又給大寺院發放了七萬石穀，並設置了名經寶和廣學寶⁵⁾，獎勵學習佛法。⁶⁾ 第四代國王光宗，酷信佛法，創大奉恩寺、佛日寺、崇善寺、歸法寺、弘化寺、遊岩寺、三歸寺等寺院，又亦仿科舉制度，設置僧科制度。國家可通過僧科考試選拔錄用僧侶，委以僧職。僧侶也可通過

2) 現存22條，其他6條因戰火而佚失，現存的22條收錄在《高麗史》(列傳·崔承老)中。

3) [韓]李丙燾：《韓國儒學史略》，亞細亞文化社1986年版，第75頁。

4) [韓]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高麗史(上)·世家·太祖》，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版，第55頁。

5) 名經寶和廣學寶中的“寶”字乃是方言。以錢穀為本，存本取息，充當經費，謂之寶。它與現今的財團很相似。參見李丙燾的《韓國儒學史略》，亞細亞文化社1986年版，第48頁。

6) [韓]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高麗史(上)·世家·定宗》，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版，第59~60頁。

僧科考試逐步晉升為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禪師(首座)→大禪師(僧統)→王師→國師。具有較高階稱的佛僧經常進出宮廷，與王公大臣平起平坐，參與國家大事。光宗中年以後，信讒言多殺生，因而他為消除罪業廣設齋會，把大量的吃穿用之物施與路人，又在寺院傍近廣置放生所，禁止屠殺，行放生。

通過對高麗初期佛教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儒佛之間已經失去了平衡，佛教已不僅僅是修身治己、安心立命之教，也成為了理國之教。它既指導人們的精神生活，又指導人們的實際生活。高麗太祖時設置的僧職、海會⁷⁾，到光宗時已正式實行僧科制度，這使得僧侶開始參與國家日常行政事務，與其他大臣一起協助國王治理國家。同時，各大寺院常設各種財庫(如名經寶和廣學寶)，經常參與民間借貸。佛教勢力的增強，佛事的繁多，導致了許多弊端，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社會矛盾。國家廣設寺院佛塔，耗費了大量財力和民力。民眾為供養祈福也消耗了民財。各種名目的法會、道場、法席、齋會不僅也消耗了大量人力和財力，而且又使佛教偏向形式化的祈福禳災，從而缺少教理上的探索。此外，一些無賴、罪犯還把佛教作為保護傘，落發出家，來往於各寺院和僧侶之間，過著遊行求乞的生活。凡此種種，正是第六代國王成宗和崔承老說面對的社會現實。故此，崔承老以成宗的崇儒態度為契機，曆陳“五朝政績”，上書《時務二十八條》，從而提出了自己的崇儒抑佛觀。

III. 崇儒思想

崔承老的儒學思想屬於漢唐儒學範疇，也可稱之為政治哲學。西元982年，高麗第六代國王成宗即位，他是高麗朝最為重儒、崇儒的一位君王。在他即位之初，就令其“京官五品以上，各上封事，論時政得失”⁸⁾。時任正匡行選官禦事上柱國的崔承老，曆

7) “海會”為選拔僧侶的一種制度。參見金煥泰的《韓國佛教史概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頁。

8) [韓]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高麗史(上)·世家·成宗》，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版，第66頁。

陳先王之得失，上奏《時務二十八條》。在奏事中，崔承老廣泛引用儒家經典，如《論語》、《易傳》、《禮記》、《春秋左傳》等，告誡君王要順天命、施仁政。

首先，崔承老以儒教的天命觀來告誡君王要順從天命，以德配天。他評價太祖統一後三國，建立高麗，乃是稟受天命，眾望所歸。

當初剪亂夷凶，天生前主，而假手在後，膺圖受命，人知聖德以歸心。於是，值金雞自滅之期，乘丙鹿再興之運，不離鄉井，便作闕庭。定遼溟之驚波，得秦韓之舊地。十有九載，統一寰瀛，可謂功莫高矣！德莫大焉！⁹⁾

在新羅統治者失道，導致社會混亂的狀況下，“天”授太祖以聖德統合人心，安定紛亂的社會。反過來講，太祖是以其仁德之心與仁德之舉配從“天命”的。行仁德才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太祖建立高麗，乃是稟受天命，以德配天，這充分體現了儒學中的“湯武革命”思想。雖然，天命觀在一定程度上有“宿命論”的傾向，但崔承老在強調順從天命的同時，也強調了人為的重要性。崔承老對定宗與忠義之士設計將覬覦王位的王規等剷除，使王位得以在王室中延續一事，評述說：“雖由天命，亦在人謀。”¹⁰⁾他還評述成宗，說他是以上聖之德，配受天命，成為君王的。

“伏惟殿下以上聖之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遜讓之恩，纂列聖厯鴻之業。無一物不樂其生，無一夫不獲其所。內外同歡，人神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¹¹⁾

可以看出，崔承老一方面強調了君權天授，另一方面又強調了君王要行仁德來配從天命。他既為君權找到了合理的根據，又給君權加上了德的限制。

其次，崔承老告誡君王要實行儒家的仁政思想。他認為太祖王建受天命，施仁政，故而才能統一後三國。崔承老在評價先王政績時，高度讚揚了太祖的仁政，說：

9) [韓]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高麗史(下)·列傳·崔承老》，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版，第79頁。

10) 上揭書，第80~81頁。

11) 上揭書，第83頁。

自成一統以來，勤政八年，事大以禮，交臨以道，居安無逸，接下思恭。貴道德、崇節儉。……賞罰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知其勸懲之道，得帝王之體者。¹²⁾

從中可以看出，崔承老非常強調儒家的仁政思想。他認為好的君王要勤政，賞罰分明，遵從禮法，交友以道義，貴道德，崇節儉，不要荒淫奢侈。這一仁政思想既可以說是一種政治哲學，也可以說是一種道德哲學。為政以德，無為而使天下歸之。對於如何施仁政，崔承老還說：

但要君安於上民，悅於下體。雖貴為君主而不自尊大，富有才德而不自驕矜。唯敦恭己之情，不絕憂民之念。¹³⁾

又對成宗王說：

若聖上執心撝謙，常存敬畏，禮遇臣下，則孰不罄竭心力，進告謀猷，退思匡贊乎。此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願聖上，日慎一日，不自驕滿，接下思恭，儻或有罪者，輕重並論如法，則大平之業，可立待也。¹⁴⁾

由以上內容可以看出，崔承老特別強調君王要謙恭不自驕，要時刻反省以修身；要禮遇臣下，賞罰分明不亂以治國；要憂國憂民，德以遠人以平天下。同時，崔承老還強調要把這一仁政思想擴展到國際交往之中，強調要施仁政，守道義，使鄰國來服，“渤海以我國家舉義而歸”¹⁵⁾，不與無道之國交往，契丹“無道之甚，不足與交”¹⁶⁾。

再次，崔承老告誡君王要秉持仁、義、禮、智。孟子有雲：“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

12) 上揭書，第80頁。

13) 上揭書，第83頁。

14) 上揭書，第85~86頁。

15) 上揭書，第79頁。

16) 上揭書，第79頁。

也，弗思耳矣。”¹⁷⁾ 就是說，仁義禮智四端乃為人之本性，人人本具。雖然人性本善，固有四端，但如果不對其擴而充之，則往往會被物欲所蒙蔽，棄善從惡。所以說，是否秉持仁、義、禮、智是判斷人之善惡的重要標準。因此，崔承老評價高麗先王說：

惠宗有保全骨肉之功，可謂友於之義也。定宗先知亂萌，克定蕭蕃之難，而再安宗社，傳授至今，可謂智謀之明也。光宗八年之理可方三代，又朝廷儀制頗有可觀，所謂善否之均也。景宗放先朝冤獄數千，燒積年讒毀之文，所謂寬仁之至也。¹⁸⁾

雖然，在五朝政績評中，崔承老對惠宗、定宗、光宗、景宗四代先王的批判較為苛刻，但在仁義禮智方面，他對四者還是給予了充分地褒揚。崔承老認為，惠宗對有人讒毀其兄弟(後來的定宗)有異圖，置之不理，保存了兄弟之情，此乃“義”也；定宗與忠義之士定計劃除了覬覦王室的王規等人，安定了宗廟社稷，此乃“智”也；光宗依循中華禮樂制度，設科舉，重文士，此乃“禮”也；景宗釋放先朝冤獄者數千人，又燒毀了大量的讒毀之文，此乃“仁”也。惠宗、定宗、光宗、景宗都能在一些方面秉持了仁義禮智。所以，以上聖之德稟受天命的成宗，更應該秉持仁義禮智，並擴而充之。

最後，崔承老還強調要別貴賤，定尊卑，恪守儒教的綱理倫常。他說：“禮樂詩書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華。”¹⁹⁾ 新羅之時，文物禮樂制度乃效仿唐制而建。公卿百僚庶人，衣服鞋襪，各有品色。公卿百僚朝會時，要穿公闌、具穿執，退朝後可以穿便衣，但庶人百姓不得穿著文彩之物。這樣，才能體現出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但是，高麗朝自太祖以來，無論貴賤，皆任意穿著。雖貴為公卿，但家貧者不能備公闌；雖賤為百姓，但家富者卻用綾羅錦緞。公卿百僚庶人，穿著不一，任意而為。這樣在迎接他國使臣之時，百官禮服就難以合乎禮法，從而自取其辱。所以，“乞令百僚朝會，一依中國及新羅之制，具公闌穿執，奏事之時，著襪靴絲鞋革履，庶人不得著文彩紗縠，但用綢絹。”²⁰⁾ 這樣才能體現出貴賤有別，尊卑

17) [宋]朱熹：《孟子集注·告子章句上》，《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28頁。

18) [韓]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高麗史(下)·列傳·崔承老》，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版，第83頁。

19) 上揭書，第85頁。

有序。不僅衣著要有制，家舍也要有制。崔承老上奏要酌定尊卑家舍制度，說：

禮雲：天子堂九尺，諸侯堂七尺，自有定制。近來人無尊卑，苟有財力，則皆以營室為先。由是諸州郡縣及亭驛津渡豪右，競構大屋，踰越制度。非但盡一家之力，實勞百姓，其弊甚多。伏望命禮官酌定尊卑家舍制度，令中外遵守，其已營造踰制者，亦令毀撤，以戒後來。²¹⁾

家舍和服飾一樣，都是貴賤、尊卑等級的體現，所以，家舍的建造一定要合乎禮法，不能越禮。孔子曾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²²⁾家舍、服飾等日常生活制度一定要遵從一定的禮樂制度。否則，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百姓不像百姓，貴賤無別，尊卑不分，社會秩序將難以維持。

此外，雖然崔承老十分強調學習中國的詩書禮樂之教和君臣父子之道，但他也並未使之絕對化、教條化。他說：“華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習俗，各隨土性，似難盡變。”所以，“車馬衣服制度，可因土風，使奢儉得中，不必苟同。”²³⁾可以看出，崔承老在強調以儒教治國時，並未盲目地尊大，而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力圖保持自身的獨特性。

綜上所述，即是崔承老的崇儒思想。

IV. 抑佛思想

崔承老完全是一個漢唐儒者，他對漢唐儒學的仁政思想、禮教思想、人倫思想推崇備至，並用它向高麗的國教——佛教——展開了積極地批判。他認為高麗佛教

20) 上揭書，第85頁。

21) 上揭書，第86頁。

22) [宋]朱熹：《論語集注·八佾》，《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61頁。

23) [韓]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高麗史(下)·列傳·崔承老》，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版，第85頁。

在很多方面不合於儒教，給社會帶來了種種弊端。首先，崔承老在《時務二十八條》中，說：

我國春設燃燈，冬開八關，廣征人眾，勞役甚煩。願加減省，以紓民力。又造種種偶人，工費甚多，一進之後便加毀破，亦甚無謂也。²⁴⁾

世俗以種善為名，各隨所願，營造佛宇，其數甚多。又有中外僧徒欲為私住之所，競行營造。普勸州郡長吏，征民役使急於公役，民甚苦之。願嚴加禁斷，以除百姓勞役。²⁵⁾

崔承老認為，國家每年舉行一次的燃燈法會和八關法會，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勞民傷財，於社會不利。所以，應當減少次數、節省開支。國家京都尚如此，地方州郡更是以種種名目征民營造寺塔，勞役百姓過甚，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負擔。所以，應當嚴令禁止地方競造寺塔。可以看出，崔承老是從勞民傷財的角度來反對國家及州郡廣置寺院、法會的，他並未否定佛教本身的教義、教理。其實，崔承老所反對的是國家崇佛、過度崇佛，而並不反對個人崇佛。

崇信佛法，雖非不善，然帝王士庶之為功德，事實不同。若庶民，所勞者自身之力，所費者自己之財，害不及他；帝王，則勞民之力，費民之財。昔梁武帝以天子之尊，修匹夫之善，人以為非者。以此是以帝王深慮其然，事皆酌中，弊不及於臣民。²⁶⁾

崔承老認為個人崇佛，其所勞所費皆為自己的財力，如有害處也只是自害。但君王公卿崇佛，其所勞所費皆是百姓的財力，從而損害了百姓的利益。君王乃是國家百姓的道德模範，所言所行要皆以民為本。因此，君王不應為己之私欲，勞民之財力。君王理應廣施仁政，養民、保民，不擾民，這才是為政之本，君王之風範。

其次，崔承老指責君王依佛教因果報應之說，廣置法會、齋會，大行佈施。他認為

24) 上揭書，第85頁。

25) 上揭書，第86頁。

26) 上揭書，第86頁。

普施結緣，消除罪業，只是“種來生因果，鮮有益於見報”²⁷⁾。即使有現報，也只是小恩小惠。所以，“人君惟當一心無私，普濟萬物，何用役不願之人，費倉庫之儲，以求必無之利乎”²⁸⁾。實際上，在崔承老看來，一方面，“人之禍福貴賤，皆稟於有生之初，當順受之。”²⁹⁾ 也就是說，人的禍福貴賤，出生之時就已確定，此乃天命，而非是因果報應輪回所致。人只要盡人事，待天命，順而受之正即可。所以，君王只要賞罰分明，懲惡勸善，就可以擁有福壽。另一方面，眾多的法會、佈施不僅浚民膏血，而且還導致了一些好吃懶做之徒及犯罪者變形為僧或乞丐，摻雜在諸僧之中，不勞而獲，躲避懲罰。所以，君王不應惑於因果報應之說，應禁行法會消罪，佈施飯僧。

再次，崔承老不僅告誡君王應禁止國家置辦過度的佛事，而且還指出了佛教本身的腐朽墮落。

凡佛寶錢穀，諸寺僧人各於州郡差人勾當，逐年息利，勞擾百姓，請皆禁之。³⁰⁾

臣聞僧人往來郡縣，止宿館驛，鞭撻吏民，責其迎候供億之緩，吏民疑其銜命，畏不敢言，弊莫大焉。自今禁僧徒止宿館驛，以除其弊。³¹⁾

佛教自傳入韓半島之初，就與王權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高麗朝把佛教奉為國教，這也使得一些僧侶恃寵而驕，不守佛道，其行為世俗化、功利化、腐朽化。如崔承老所說，很多寺院的僧人用佛寶錢穀與為官者勾結，放貸以取利息，榨取民脂民膏。還有一些僧人出入於宮廷，往來於官衙，止宿館驛，常常鞭撻吏民，責備其迎候之慢，真是全無出家人的謙恭、仁慈之心。

最後，崔承老還指責了寫經塑像的浮華之風。寫佛經、塑佛像，只要能保存、流傳久遠就好，根本不需要用金銀珠寶來裝飾。寫經塑像用以珍寶，不僅耗費錢財，而且往往會增起盜賊之心。所以，應該禁止寫經塑像飾以珍寶，以除其弊。

27) 上揭書，第87頁。

28) 上揭書，第87頁。

29) 上揭書，第86~87頁。

30) 上揭書，第84頁。

31) 上揭書，第85頁。

綜上所述，就是崔承老對佛教的批判。如概而言之，其批判內容主要包括：1、禁設功德齋；2、禁罷佈施；3、禁止捐佛寶錢穀；4、禁止競造寺院；5、禁止僧侶出入宮中；6、禁止僧徒宿住驛館；7、禁止用珍寶寫經塑佛。從這些內容中可以看出，崔承老主要是從社會危害的角度對佛教進行批判的，而並沒有否定佛教的教義、教理。崔承老對待佛教的基本立場是抑制佛教的種種弊端，使佛教僅在修身治心方面發揮作用，而在治國和制度構建方面，崔承老則提倡學習儒家的文物禮樂之教和君臣父子之道。

V. 余論

崔承老作為一名儒者，他對儒學中的天命思想、仁政學說、綱常倫理等都推崇備至，并用其構建社會制度，維護社會穩定。然而，當作為高麗國教的佛教因自身的腐朽、墮落、俗化，給社會帶來眾多危害時，崔承老便以儒學為工具，向佛教展開了批判。實際上，就崔承老對佛教的批判內容來看，他並不是否定佛教，而是要抑制佛教的種種弊端。崔承老認為在特定的領域中仍然需要發揮佛教的作用。實際上，在崔承老看來，儒佛道三教並不衝突，而是各有分工，互為補用。

且三教各有所業，而行之者不可混而一之也。行釋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國之源。修身，是來生之資；理國，乃今日之務。今日至近，來生至遠，捨近求遠，不亦謬乎。³²⁾

崔承老認為，儒教是理國之源，其用為今日之務；佛教乃是修身之本，其用為來生之資。今日就在眼前，來生還很遙遠，捨近求遠，乃是大錯特錯。然今日之人，不僅多做佛事，以求來生福報，而且還打破了儒佛的“所業”界限，使佛教也參與理國，因而，導致了種種社會弊端。所以，崔承老向成宗上奏《事務二十八條》，希望以儒教的“詩書禮樂之教，君臣父子之道”治理國家，抑制佛教現有的種種弊端。

³²⁾ 上揭書，第87頁。

實際上，韓國哲學非常鮮明的一個特點就是儒佛融合或儒釋道三教融合。自三國時代(高句麗、百濟、新羅)開始，儒、釋、道三教就和合共生，互為補用。首先，在新羅，既有依三教之旨而形成的風流思想，強調“入則孝於家，出則忠於國，魯司寇之旨也；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諸惡莫作，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³³⁾ 又有圓光法師提出的世俗五戒，強調事君以忠、事親以孝、交友以信、臨戰無退、殺生有擇。³⁴⁾ 其次，在高麗，太祖的《十訓要》將佛教和道教的精神信仰，融匯在儒教的齊家治國之中，試圖在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儀式下，達到儒教理家治國的目的。誠如李甦平教授所說，儒釋道的三教和合乃是高麗王朝的一種思維定勢。³⁵⁾ 因此，崔承老在儒佛關係上也並未跳出儒釋道“三教和合”的思維定勢。但是，由於崔承老清楚地看到了高麗佛教的腐朽、墮落及產生的種種，他的思想核心或重心仍在於倡導儒學的治國之方，建立儒學的綱常倫理道德。弊端，所以，他高揚儒教治國理念，以其抑制佛教。崔承老只是抑佛，而並未排佛

【參考文獻】

- [1] [韓]韓國學文獻研究所編：《高麗史》，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版。
- [2]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李丙燾譯注，乙酉文化社1987年版。
- [3] [韓]李丙燾：《韓國儒學史略》，亞細亞文化社1986年版。
- [4] [韓]韓國哲學會編：《韓國哲學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 [5] [韓]金煥泰：《韓國佛教史概說》，柳雪峰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 [6] 魏常海：《韓國哲學思想資料選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
- [7] 李甦平：《韓國三教和合的現代價值》，《現代哲學》，2000年第4期。
- [8] [韓]金益洙：《儒家의 排佛思想——主로 高麗時代를 中心으로》，《韓國思想》(第19輯)，친도교중앙총무출판부1982年。

33)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上)，李丙燾譯注，乙酉文化社1987年版，第83頁。

34)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下)，李丙燾譯注，乙酉文化社1987年版，第347頁。

35) 李甦平：《韓國三教和合的現代價值》，《現代哲學》，2000年第4期，第88頁。

Abstract

Cui Chenglao's opinion of Advocating Confucianism and Restraining Buddhism

Li, Hai-Tao

Korea confucianist Cui Chenglao,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condition of the day and Chengzong's attitude of advocating Confucianism, brought forward the opinion of advocating Confucianism and restraining Buddhism, which emphasized the thought of taking Confucianism as the best way to rule a country and restrained social corruption of Buddhism. The Confucianism that Cui Chenglao advocated is Hang-Tang Confucianism. Cui advocated the thoughts of benevolent governance, moral codes and human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he used these thoughts criticized Korean state religion-Buddhism. He thought that Korean Buddhism collided with Confucianism in many ways and caused much social corruption. It is observed that Cui mainly criticized Buddhism in terms of social corruption, and he didn't negate the creeds and dogmata of Buddhism. In other words, he just wanted to restrain Buddhism with Confucianism, but not eliminated Buddhism.

Key Word

Cui Chenglao Confucianism Buddhism Koryo-Dynasty

• 논문투고일 : 2011.5.28 심사완료일 : 2011.7.29 게재결정일 : 2011.8.5